

吴怀祺 主编
汪高鑫 著

中国史学 思想通史



秦汉卷

黄山书社

中国史学 思想通史



秦汉卷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吴怀祺主编,汪高鑫著.
- 合肥:黄山书社,2002.2
ISBN 7-80630-723-0

I.中... II.①吴... ②汪... III.史学史:思想史
- 中国-秦汉时代 IV.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6142 号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875 字数:364 千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平):27.00 元

定价(精):35.00 元

导 言

秦汉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在史学上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首先从史书撰述而言。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属于秦皇朝的,有《奏事》20篇;属于西汉人撰述的则有陆贾《楚汉春秋》、司马迁《太史公书》(即《史记》)等六家著作共343篇。而东汉时期的史书,根据清人的考证,总数不下于100部。以上统计只是就纯史书撰述而言,还不包括思想家的著作。这些史书绝大部分已经散佚,所幸的是,堪称为里程碑之作的《史记》和《汉书》,却被流传了下来。其次从历史编撰而言。这一时期历史编撰成就之最为重要的表现是西汉司马迁撰述《史记》,创立纪传体史书体裁。之后,东汉班固又撰述《汉书》,通过改通史记传为断代纪传,又整齐划一纪传体为本纪、列传、志和表四种体例,从而对《史记》所创立的纪传体体裁作了进一步的发展。纪传体的创立,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历史编撰上所取得的成就,还表现在荀悦《汉纪》对编年体的进一步完善。荀悦撰述《汉纪》,采用了连类列举的记载方法,不但使编年体的记述范围得到了扩充,而且还使记述内容更为集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以往编年体的记述缺陷。最后从史学思想而言。史学思想不仅是指史学家对客观

历史和史学本身的认识,而且还包括思想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也就是说,秦汉时期的史学思想既包括如司马迁、刘向、班固、荀悦等史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认识,也包括如董仲舒、王充、何休等思想家对历史的认识。毫无疑问,秦汉是产生史学巨匠和思想巨人的时代,因而也是史学思想极为丰富的时代。而这些丰富的史学思想的产生,无疑是这一时期史学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秦汉时期博大精深的史学思想,无疑是秦汉史学家和思想家们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我们通过对秦汉时期史学思想的研究,就对史学本身的认识而言,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和提高对秦汉乃至中国古代史学变化和发展的认识;就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言,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秦汉乃至中国古代历史变化和发展的认识。因此,重视对秦汉时期史学思想的研究,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告诉我们,作为社会意识的史学思想,自然不能脱离于社会的存在而产生。实际上,秦汉史学思想就是秦汉社会存在及其社会矛盾运动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秦汉史学思想时,一定不能脱离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我们不但要重视探讨秦汉的政治、经济之于秦汉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还要重视作为两汉统治思想的经学之于史学的影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第一节 秦汉社会与史学思想

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首先表现为封建等级制度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当中普遍地确立起来。从封建社会关系而言,皇帝不但是封建国家最高政治权利的拥有者,而且也是封建国家最大的地主。在皇帝之下,存在着一个广大的世家地主阶层,他们主要是由皇族、外戚和功臣等构成。世家地主拥有世袭特权,是地主阶级当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阶层。世家地主的剥削对象是由封建国家恩赐的具有国家户籍的农民,而这种农民在当时的农民阶级当中居于多数,他们向世家地主交纳地租也就等于是向国家交纳赋税。在地主阶级中,与世家地主相对应的还有豪族地主和高资地主,这一地主阶层虽然在经济上可能很富有,但却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因而是地主阶级中的下层。从封建政治制度而言,秦皇朝实行的是郡县制,而两汉则采用郡县、封国并行制。在这种政治制度中,以郡或封国作为地方最高机构,郡或封国之下有县,县之下还有地方基层机构。这种封建政治制度,无疑是体现了封建等级关系的。^{〔1〕}其次表现为大一统政治的建立。秦汉大一统政治的建立,一方面是通过战争,结束了社会长期分裂的状况;一方面则是通过北击匈奴、经营南越,而使疆域得到了开拓。在秦汉政治一统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诞生了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这无疑这是

〔1〕 以上观点借鉴了白寿彝先生的封建社会分期说,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第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一时期大一统政治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最后表现为适应封建政治需要的封建统治思想的建立。秦汉时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选择和确立期。先是秦皇朝推行法治政策,由于“举措太众、刑罚太极”,〔1〕结果导致二世而亡;汉初有鉴于秦的败亡,而推行了黄老治国思想,结果使西汉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为适应封建政治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最终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上述秦汉社会所呈现出的种种社会特点,要求秦汉的史学要适应这一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需要。为此,史学家们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对这一伟大历史时期的伟大变革及时地加以记录,作出反映;另一方面,史学家们还应该对这一伟大时期的历史变革进行历史思考,作出历史的解说。也就是说,秦汉时期史学思想的产生,是适应并服务于秦汉时期政治需要的结果,秦汉的史学思想与秦汉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由于秦汉社会的发展明显地存在着阶段性,因而,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秦汉的史学思想也明显地表现出了阶段性的特点。

秦汉史学思想史的第一个阶段,是从秦的统一(前 221 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前 141 年)。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总体特征是封建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初步巩固,封建政治等级秩序的建立,以及对封建统治思想的抉择。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最终结束了自东周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秦

〔1〕 陆贾:《新语》卷上《无为》,王利器《校注》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下引此书版本同。

始皇为巩固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封建统治,在政治上确立皇帝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从而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封建等级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使黔首自实田”的政策,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统一度量衡和货币,以适应大一统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在军事上一方面北伐匈奴,一方面经营南越,在积极开拓边疆的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在思想文化上一方面实行“书同文”的有利于思想文化发展的政策,一方面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同时,在统治思想的选取上,确立了法家思想作为政治统治思想。秦皇朝通过采取上述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真正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封建政治大一统观念也因此而得到了强化。但是,这些举措却没有使秦皇朝的封建统治得到巩固,相反,由于它一味推行法治,“举措太众、刑罚太极”,封建皇朝的统治仅仅持续了十余年时间就迅速败亡了。

继秦而建的西汉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皇朝。西汉立国初年,所面临的政治局势是非常严峻的。首先是秦末持续数年的战争,造成了社会经济满目疮痍的局面;其次是北部强大的匈奴屡屡犯边,构成了对西汉政权的严重威胁;又次是王国势力的逐渐强大,时时威胁着中央集权的统治。面对这样一种困境,统治政策稍有不慎,就难免会重蹈秦皇朝灭亡的覆辙,使新兴政权毁于一旦。为此,起于闾巷之中的开国皇帝刘邦及他的大臣们,一方面认真吸取秦皇朝失败的历史教训,一方面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从而制定了一套以黄老思想为内容的封建治国思想。这种黄老治国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则是清静无

为,减省刑罚;表现在经济上则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表现在文化上则是注重文治,复兴文化。正是由于西汉统治者积极采取并推行了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西汉皇朝经过六七十年的治理之后,终于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封建盛世景象,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因此而得到了初步的巩固。

秦汉之际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是紧密相连的。早在秦国行将统一全国前夕,秦相吕不韦曾经为秦国日后怎样行使对全国的统治制定过一部治国纲领,这便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的主旨思想是黄老道家思想,宣扬“人法天地”、清静无为,同时也重视尊王。由于吕不韦政治上的失败,更主要是由于《吕氏春秋》所崇尚的黄老道家思想与秦始皇的法治思想相距甚远,致使这部治国大纲没有在日后大一统的秦皇朝政治统治实践中发挥效用。秦统一以后,实际上所推行的治国思想是秦始皇、李斯君臣所推崇的法家思想。然而,也正是由于秦皇朝一味地推行严刑酷法,结果导致了嬴氏政权的二世而亡。西汉建国后,认真吸取了亡秦的教训,积极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这一时期,随着文化的复兴,诸子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阐发。其中,尤其是黄老道家学术思想得到了大力弘扬,而成为这一时代的统治思想。当年弃之未用的《吕氏春秋》,在新的历史时期反而受到了人们的青睐,西汉武帝前期成书的《淮南鸿烈》,便是淮南王刘安仿效《吕氏春秋》而召集宾客编撰而成的一部重要的黄老道家著作。如果说《吕氏春秋》是为行将统一全国的秦朝预备的一部治国纲领,那么《淮南鸿烈》则是对汉初推行的黄老政治所作的一种理论总结。在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位重要的黄老道家人物,他就是史学家司

马谈。司马谈通过撰述《论六家要指》，一方面从黄老道家立场出发，对诸子学术思想作了全面评述，为中国学术史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则对作为汉初治国思想的黄老道家学术思想之特点作了系统的论述。《论六家要指》无疑是一部汉初黄老道家的纲领性文件。从上所述可知，秦汉之际的学术思想是自觉地服务于秦汉之际政治统治的需要的。

作为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之际的史学思想也是紧密地服务于这一时期政治统治的需要的。这一时期史学的主题思想是“过秦论”。由于社会历史经历了从秦亡到汉兴的历史巨变，时代要求史学家、思想家们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以为新皇朝的政治统治提供历史借鉴。如陆贾作《新语》，阐述秦所以失天下和汉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便是奉刘邦之命而撰的。在《新语》中，陆贾肯定秦亡的原因在于“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有鉴于此，他提出了“行仁义、法先王”，以无为而致有为的治国主张。贾谊则一连作了三篇《过秦论》，一方面认为秦皇朝不懂得“攻守之势异”的道理，“以暴虐为天下始”，从而导致了国家的败亡；一方面则注重阐发了以民为本和以礼治国的思想。很显然，陆贾、贾谊等人作“过秦论”，实际上是通过发挥史学的鉴戒功能，以服务于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

秦汉史学思想史的第二个阶段，是从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即位至西汉的灭亡。西汉前期，由于一直坚持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经过六七十年的与民休息，终于迎来了“民则人给家足”的“文景盛世”局面。然而，建元元年汉武帝即位后，便再度对封建统治思想进行了调整。他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的建议,将儒家思想确定为封建统治思想。〔1〕汉武帝为何要调整统治思想?究其原因,其一是黄老思想虽然使西汉皇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它毕竟是先秦道家的支流,具有浓厚的无为色彩。这种无为,在政治上则表现为一种保守性,缺乏进取精神。这种少生是非、少动干戈的思想,对于发展经济是有利的。但是,对于解决政治上的王国问题和军事上的匈奴之患,便显得力不从心了。其二是儒家学说内蕴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之义,迎合了有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要求。汉武帝希望通过申明尊王和大一统之义,来解决王国问题,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通过申明攘夷之义,发动对匈奴的讨伐战争,以此来消除边患,巩固国防。同时,儒家的仁政主张与黄老道家的与民休息思想并不是相抵触的,而是相一致的。其三是汉武帝所独尊的儒术,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先秦孔孟之儒,而是注重于阐发天人关系和吸纳了法家、阴阳家等诸家思想的董仲舒之儒。重视阐发天人关系,是要从天道观的高度来论证封建专制统治的合理性;重视吸纳诸家思想,体现了这种儒术有着较大的包容性,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2〕便是对这种儒术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汉武帝确立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后,在内政上主要是接受了主父偃的“推恩”建议,颁布“推恩令”,从而最终消除了王国势力,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同时,对外则发动了大规模的讨伐匈奴的战争,并且

〔1〕关于董仲舒对策时间,学术界说法不一,此姑从宋司马光,清苏舆建元元年(前140)说。

〔2〕《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引此书版本同。

取得了这场战争的决定性的胜利,西汉政权的边患因此而得以消除。至此,汉初构成对中央政权严重威胁的两股势力都被铲除了,西汉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盛世时期。然而,西汉历史未能逃脱盛极而衰的法则。由于汉武帝发动连年不断的对匈奴和西南夷的战争,又大兴土木,加上生活极其奢侈,文景盛世时期所积累的物质财富因此而被挥霍一空。到汉武帝晚年,西汉国家财政已是严重亏虚,统治危机日益严重。汉昭帝即位后,于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就武帝之后西汉的国策和指导思想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次会议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结束武帝的战争政策,重新实行与民休息政策的标志;同时,从指导思想来说,原来糅法于儒的儒家思想开始自觉地对法家思想采取排斥的态度。宣帝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于甘露三年(前51年)召开了旨在讲明五经异同的石渠阁会议,宣帝“亲称制临决”。会议的结果,立《谷梁春秋》于学官,扩大了经学师法的范围。由于统治政策和统治思想的变化,昭、宣之时,西汉的国势一度出现了中兴的气象。然而,这种局面并未维持多久,西汉历史很快便步入了元、成、哀、平衰世时代。西汉末年政局衰败,最主要的表现是王权的衰微和外戚势力的强大。王莽之所以能篡汉,便是这种外戚势力不断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同时,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经学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经学当中分化出了古文经学派;一方面则是经学(主要是今文经学)逐渐与谶纬迷信神学相结合,儒家思想神学化。

与开始于汉武帝时期的西汉政治空前大一统和学术思想上的“独尊儒术”局面相适应,这一时期史学的主旨思想则是致力

于阐发“大一统”之义。前已述及,中国封建大一统政治缔造于秦汉之际。然而,由于历史出现了秦亡汉兴的巨烈变动,“过秦”便成了这一时期史学家、思想家们的论述主题,他们还无暇顾及到对这种大一统政治作出理论论证。随着汉武帝时期空前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时代要求史学家、思想家们对于“大一统”之义作出系统的阐发和论证。董仲舒便是在这个伟大时代脱颖而出的杰出的思想家。为对“大一统”之义作出系统的理论论证,董仲舒一方面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天人感应学说,从天人合一、天人一系的高度论证了大一统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以《公羊传》为其大一统理论依据,对“大一统”之义从形上和形下两个方面作了系统论证和重要发挥。在董仲舒看来,“大一统”形上之义在于立“元”正始,而其形下之义则是王者一统。为了建立起王者一统的政治历史统治秩序,董仲舒在政治上鼓吹尊王;在思想上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民族关系上强调夷夏之辨和以夏化夷。正是由于有了董仲舒的系统阐述,从而使大一统理论因此而成为汉代公羊家的一种重要理论。从上可知,董仲舒实际上是西汉时期大一统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司马迁则是这一伟大时代对大一统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史学家。《史记》从编撰体例到记述内容,无不内蕴了大一统的思想。与董仲舒一样,司马迁也提出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思想大一统的主张,^{〔1〕}只是他的这种学术思想大一统的路径与其师董仲舒不尽相同。

〔1〕《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下引此书版本同。

秦汉史学思想史的第三个阶段是东汉时期。公元 25 年,刘秀称帝于洛阳,东汉历史由此开始。由于光武帝刘秀亲身经历了西汉末年的历史巨变,故而重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主动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政权统治的措施。具体而言,表现在经济上,是积极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主要包括释放和禁止虐杀奴婢,使他们成为庶人,在缓和社会矛盾的同时,也解决了社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问题;通过假民和赋民公田的办法,以安顿人民,进行垦荒生产;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以养育民力。表现在政治上则主要是加强皇权统治,具体包括削弱三公的权利,使尚书台成为处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设置御史台、司隶校尉和州刺史,以加强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制度(东汉中后期刺史成为割据势力,这是刘秀始料不及的)。通过这些举措,东汉政权因此而得以稳定,出现了“光武中兴”的局面。明、章之时,继续贯彻执行光武帝以来的统治政策,东汉历史步入了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

与这种巩固政治统治的举措相适应,东汉前期的统治者也实行了宽松的思想政策,对西汉末年以来就已经分化成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谶纬神学三股经学势力采取普遍扶植的态度,遂使东汉前期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三足鼎立之势。光武帝由一介儒生而登上了帝王宝座,主要是依靠了谶纬神学作为精神支柱。他即位以后,便仿效起王莽,“宣布图谶于天下”。上有所好,下必效之。谶纬神学很快便成为东汉初年风靡一时的学问,不但处于官学地位的今文学家大谈谶纬,古文学家也涉足其间。不过,尽管谶纬神学势力很大,它毕竟是经学的别传,无法像正宗经学那样在东汉官方意识形态中居于正统地位。上述统治者对

于意识形态的宽松政策,一方面固然使经学三派因此而普遍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则也导致了三派内部相互间的制约和斗争。这种意识形态的不统一现象,与东汉政治大一统局面显然是不相吻合的。有鉴于此,汉章帝便仿效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于建初四年(79年)下诏召开了有经学各派参加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统一经学各派,汉章帝“亲称制临决”。会后由史学家班固根据会议记录整理而成《白虎通》一书。《白虎通》的基本思想与董仲舒思想相类,也是以封建纲常伦理道德为主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骨架。所不同的是,董仲舒的思想是公羊学一家言,而《白虎通》的思想则是吸纳了今古文经学和谶纬神学诸家经学的观点。《白虎通》规定了东汉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部大经大法。

汉和帝后,东汉历史开始步入长达一百余年的危机时期。这种统治危机的具体表现,从统治阶级内部而言,其一是宦官、外戚轮流专权,王权统治出现严重危机;其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批有识之士与宦官、外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以至酿成党锢之祸。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而言,则主要是由于土地兼并而导致农民破产,由此而引起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与东汉中后期政治统治危机相伴随的是作为统治思想的神学化的经学(官学)也逐渐走向衰落。东汉神学化的经学盛行于光武、明、章三朝,自和帝起便盛极始衰了。而随着官方神学化的经学的逐渐衰落,在学术思想上则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首先是在官学衰落的同时,私学因之而兴起。神学经学的衰落,一方面是封建统治意识形态危机的表现,一方面却有利于打破东汉经学的家法传授;而这种家法桎梏被打破,是有利于学术的融合和通

经博学之士的出现的。其次是社会批判思想的出现。东汉后期的社会批判思想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下层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因政治统治的日益腐朽而仕途被阻,激于义愤,同时也是出于对国运的担忧,而对朝政进行抨击;另一类则是承继了王充以来的理性批判传统,着重于对神学进行抨击。又次,东汉神学化的经学虽然逐渐趋于衰落,但是,纲常名教思想的宣传反而在这一乱世时期更加强化了。即使是当时所涌现出的批判思想,其主旨也是为了维护这一纲常名教。

东汉社会历史发展的纷繁复杂性,决定了这一时期史学思想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而在这些史学特点当中,“宣汉”思想无疑是其中的主旨思想。其实,西汉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汉皇朝的政治作了颂扬,如《史记》对西汉大一统政治所作的颂扬便是一个具体事例。但是,这一时期的“宣汉”意识还并不强烈,“宣汉”也并没有成为时代史学思想的主潮。当历史进入东汉后,由于刘汉政权经历了兴衰之变后,又很快步入了一个新的兴盛时期,时代要求史学家、思想家们必须对这种政权的更替作出解释,对刘汉政权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而正是在这种解释和评价的过程中,“宣汉”的史学思想得到了具体的阐发。首先,大力宣扬天命皇权思想。众所周知,刘汉政权有着一个不同寻常的经历。先是刘邦起于闾巷,无尺土之封,却建立起了赫赫帝王基业;接着则是刘汉政权历经二百余年的统治之后,一度被王莽所取代;可是还未过二十年,刘秀便又重新建立了东汉政权,出现了“光武中兴”的局面,刘汉政权因此而失而复得。对于刘汉政权的兴衰之变,东汉史家则从神意的角度作了解释。而这种神意史观的具体内涵,就是“汉为尧后”说。

最早宣扬“汉为尧后”说的是西汉后期的眭孟和刘歆,不过,他们鼓吹“汉为尧后”说,旨在劝说刘汉仿效唐尧禅让故事,这当然不会被东汉史家所接受。但是,这种“汉为尧后”说却被东汉史家广泛用来作为解说汉兴的原因。先是班彪在两汉之交时作《王命论》,肯定“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并明确认为汉兴的首要原因就是刘邦乃“帝尧之苗裔”。〔1〕面对两汉之交的混战局面,班彪的拥护刘汉立场非常坚定。他曾以“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至”〔2〕来劝说当时割据天水的隗嚣归顺于刘秀。《王命论》的神意思想被班固作《汉书》所继承和发展。班固宣扬“汉为尧后”说,集中见诸《汉书·高帝纪赞》。在该篇中,班固详细考证出了一个“汉为尧后”的刘氏世系来,并明确指出“断蛇著符”便是刘氏“德祚已盛”,奉天命建汉的具体标志。东汉末年史家荀悦作《汉纪》,则掇拾了班氏父子的神意之说。《汉纪》以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为开篇,以班彪《王命论》为结语,这种神意史观的一贯到底性是很明显的。其次,积极宣扬“汉盛于周”的思想。这里所谓“汉盛于周”之汉,主要是指西汉皇朝,有时也兼及东汉。不过,东汉的思想家、史学家宣西汉的目的是为了宣东汉,故而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由于刘汉皇朝的历史经历了盛衰之变,从而使得东汉的思想家、史学家们能更清楚、更准确地对西汉一代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在东汉思想家、史学家们看来,西汉皇朝无疑是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皇

〔1〕《汉书》卷一百上《叙传》。

〔2〕《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引此书版本同。